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解說

• 李振宏

《論語》中孔子有一段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管這段話的原意如何，它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古代平均主義思想的濫觴，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社會思想和經濟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是，孔子的本意並非如此，它的含義在中國傳統思想史上發生了衍變。事實上，從60年代以後，就開始有人提出了對這段話重新理解的問題，至今已發表直接闡述這個問題的文章十多篇^①。但所有這些文章所提出的問題，所闡述的思想，幾乎都沒有超越古人已表述過的觀點。大概對這幾句話的理解，除古人已涉及的範疇外，也不可能提出更新穎的看法。不過，從思想發展里程的角度考察，從思想傳播學的角度出發，對這個問題似乎還有重新討論的意義，還需要做更詳細地考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意究竟是甚麼，它怎麼演變成一種流行的平均主義的經濟思想，它的思想演變有沒有甚麼價值和意義等問題，都需要作進一步討論。

—

孔子的原話出自這樣一個語言背景：孔子的兩個學生冉有和季路要輔佐季氏去攻打顓臾，孔子勸阻他們。冉有強詞奪理說顓臾近於季氏的封邑費地，不解決顓臾的問題，將會對季氏的後世子孫造成威脅。孔子反駁冉有說^②：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孔子認為，治國的道理在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不在於他所佔有的土地和人民的多少，而在於國內的政治是否平均，是否公平合理；不在於國家是否富足或貧窮，

《論語》中孔子有一段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段話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平均主義思想的濫觴。但孔子的本意並非如此，它的含義在中國傳統思想史上發生了衍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意究竟是甚麼？它怎麼演變成一種流行的平均主義的經濟思想？它的思想演變有沒有甚麼價值和意義等問題，都需要作進一步討論。

後人對「不患寡而患不均」一段話的解釋，分成兩大派別。一是經學家的解釋，都把孔子(圖)所講的「寡」與「不均」理解成土地人民的寡少和政治或政教的不均平；而一般的政治家、歷史學家或文人學士，則多從財富的多少和不平均進行解釋。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思路。



而在於他的人民是否安寧，社會是否秩序祥和。從這個道理說，季氏眼下的問題恐怕不是面臨顛輿的威脅，真正對他的後世子孫構成威脅的因素，在於他的家門之內，攻打顛輿只是季氏想擴大地盤的藉口罷了。

就是這樣一段話，在後世引起了無盡的解釋。從總體上說，後人的解釋，分成兩大派別。一是經學家的解釋，都把孔子所講的「寡」與「不均」理解成土地人民的寡少和政治或政教的不均平；而一般的政治家、歷史學家或文人學士，則多從財富的多少和不平均進行解釋。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致思路徑。

我們先來看經學家的解釋。

《論語集解義疏》中引孔安國和苞氏的解釋曰^③：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註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註苞氏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也。」

按照孔安國的解釋，「寡」是指土地和人民之少，特別是人民的寡少，而不均則是政治之不平均。苞氏也持大體相同的看法，認為孔子主張的「均」應是「政教均平」。

宋人陳祥道的《論語全解》中說^④：

政之不均而患民寡，民之不安而患國貧，非知本也。《書》言罔曰民寡，惟慎厥事。《詩》言尹氏秉國之鈞，不宜空我師。是在患所政之不均，而不在民寡也。孟子言地利不如人和，又言貨財不聚非國害，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是故患在民之不安，而不在國貧也。然均則得民財，故無貧；和則得民心，故無寡；安則其本固，故無傾。周官政典，以均方政職，以聚百物，此均無貧也。孟子言得道者多助，此和無寡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安無傾也。蓋均故和，和故安，貧則無以聚人，安能無寡？寡則無與守邦，安能無傾？然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為國家以安之為終始也。不安而欲均之，不亦難乎？由均至於安，則在內者無患矣。

陳祥道所講的「寡」是民寡，更重要的，是他反覆強調了孔子所講的不均是政治的不均，和孔安國的理解完全一致。並且，他還舉出《尚書》、《詩經》、《孟子》中的有關論述作為佐證。他認為先賢所講的治國之道，都是重視政治的平均，只要政治均平，國家治理好了，天下井然、安寧、祥和，贏得民心的支持，財的問題，貧的問題，安的問題，則都可以解決了。「國家以安之為終始」，但需「由均至於安」。他用這些道理去詮釋了孔子的思想。

朱熹在《四書章句集註·論語集註》中，也對孔子的話作出了解釋。他說：「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顛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⑥這句「均謂各得其分」大概是最得要領的解釋了。朱熹認為，孔子批評季氏的為政不均，就是「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是時，作為魯國大夫的季氏實際上僭越於魯君之上，越出了他應得的禮法名分，是無道而不均。

和朱熹的解釋大體相同的，還有宋鄭汝諧的《論語意原》和南宋理宗淳祐時人蔡節的《論語集說》等。

歷代諸儒關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講解，以康熙時期命儒臣所撰的帝王教科書《日講四書解義》中所講，最為精到，最富有學理。該書卷十曰^⑦：

夫季氏之患，亦特患寡與貧耳。丘聞之，諸侯之有國，大夫之有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僭亂而不均；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之心乖離而不安。蓋所謂貧者，乃起於不均

耳。若上下之間皆得均平，則各收其所入，各享其所有，何貧之有？所謂寡者，亦由於不和耳。若上下均平，共相和睦，則在此不求有所增，在彼不知有所損，何寡之有？惟均與和，則未有不安者。名分既定，而無所疑，嫌隙不起，情誼相屬，而恆相保，禍亂潛消，又何傾之有哉？夫為國而至無貧，無寡，無傾，則內治既修，外患自息，近者悅，而遠者自服矣。

這段話不僅解釋了孔子原話的意義，而且對為甚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問題，做了邏輯上的闡釋，深得孔學之義理。無怪乎是帝王教科書，其思維之嚴密，邏輯之清晰，語言之明朗，都堪稱為文之楷模。

以上是幾則經學家對「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解釋，其共同的特點是，他們所言的「寡」是土地和人民的寡少，而其不均則是政治的不平均，是君臣之間的不能各安其分，違背了禮之大法。這是中國古代解釋孔子語最正統的一條思維路徑。他們使用的是訓詁學的方法，其思想方法是盡可能地忠實於孔子的思想原意。對照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語言背景，結合我們對這幾段引文的分析，特別是對朱熹的話的分析，可以看到，經學家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解，是符合其原意的。

二

然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一些政治家、歷史學家或文

經學家對「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解釋的共同特點是，他們所言的「寡」是土地和人民的寡少，而其不均則是政治的不平均，是君臣之間的不能各安其分，違背了禮之大法。這是中國古代解釋孔子語最正統的一條思維路徑。他們使用的是訓詁學的方法，其思想方法是盡可能地忠實於孔子的思想原意。

人學士那裏，則完全不是這樣的理解。

《周書·蘇綽傳》載，北周時蘇綽為太祖擬革易時弊的六條詔書，其第六條是均賦役，其中談到了孔子的「均無貧」說。原文曰⑦：

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

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紵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紵，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

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蘇綽的所謂均賦役，就是「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無論豪富之家，還是閭閻細民，都一律按一定的法式，「斟酌貧富，差次先後」，合理徵收，依法均攤，不能憑權勢而逃避賦稅和徭役，而將其轉嫁到細民百姓身上。很顯然，蘇綽將孔子的「均無貧」用到了經濟制度問題上，講的是賦稅賦役的平均問題。

宋代仁宗皇帝時，張方平的一封奏議中，也涉及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奏曰⑧：

昔者明王保邦，預備之道，惟於平世，始可為謀。及其已弊，救日不暇，雖有賢智，豈遑經久。今內外無事，賦入有經，而民家壁立，野無青草，設有橫出之調，緩急之率，不及均，遠應近求，具則必扶老攜幼，轉死溝壑，雖峻刑嚴禁，不能止流亡播潰之患矣。夫致理之本，在乎制度，制民之產，在乎均平。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亡貧。且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梁肉常餘。乘堅策肥，履絲曳綵，羞具居室，過於侯王，淫侈之俗，日以輕僭。賦調所不加，百役所不及，優游逸豫，專事驕靡。而農人侵冒寒暑，服田力穡以供租稅，以給絲役，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內外，勞逸之殊如此，此豈抑末敦本之道乎？

張方平將富商大賈的驕靡奢侈，與「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的農人的狀況作了鮮明的比照，以示其不平和不均，強調「制民之產，在乎均平」。正是在表述這樣的思想理念的時候，他引用了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亡貧」的說教。可見張方平也是從財富平均的角度，把孔子的話當作一種經濟平均思想的聖人遺訓。

宋神宗時期官至禮部尚書的資政殿大學士黃裳，也有關於「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解說⑨：

均財用之政，聚人之財，守邦之眾，安人之道，季氏忘此四者，有事於顛。苟得其利，則不知所謂均無貧；苟得其民，則不知所謂和無寡。顛史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明代劉寅《三略直解》云：「治民要使之平均。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治民必欲使之平均也。」劉寅把平均的對象解釋為「民」，用「治民要使之平均」來闡釋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對於民的平均，則主要是經濟上的，是平均土地、租稅、賦役等等，與經學家所謂孔子譴責季氏僭越魯君而造成政治不均的說法有根本的區別。

憂，則不知所謂安無傾。孔子曰：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臾，而在蕭牆之內。然而季氏之計，不亦誤乎？先王之政治，以下劑安之，以田里擾之，以樂昏此，庶而安之也。教之以土宜，利之以興鋤，勸之以時，器任之以強予，平之以土均，此富而安之也。不患寡而患不均，故以土均平政，成政之終。不患貧而患不安，故以田里安甯，立政之始。

黃裳對孔子語的理解是「均財用之政」，「平之以土均」，「以土均平政」，這是繼承了《周禮》「均平必自土地人民始」的財政思想，與經學家均平政事的解釋也大相逕庭。

明代劉寅《三略直解》云：「治民要使之平均。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詩》云：『赫赫師尹，不平謂何？』故治民必欲使之平均也。致民之均平，當清其心而無纖毫私欲之染，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安寧。」^⑩劉寅把平均的對象解釋為「民」，用「治民要使之平均」來闡釋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對於民的平均，則主要是經濟上的，是平均土地、平均租稅、平均賦役等等，與經學家所謂孔子譴責季氏僭越魯君而造成政治不均的說法有根本的區別。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的理學家、政治家，他學宗程、朱，但不附庸於程、朱，在很多問題上有自己的見解。他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解也不同于朱熹。他說^⑪：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語意蓋云與其不均寧寡，與其不安寧貧也。夫一物而眾分之，烏得不寡然。寡非所患，患其分之不均，雖欲

守其寡不可得耳。寡之又寡，必至於貧，然貧猶非所患，患其勢之不安，雖欲守其貧而不可得耳。夫子又釋其意，以為均雖不能無寡，然皆少有得焉，則已無貧矣，況均則必無不平之爭，其勢自和，和則有相通相濟之誼，並可無寡矣。如是則必安，安則無論，不寡不貧也。雖或寡而至於貧，然蒙孽消而根本固，必不至於傾矣。此有國家者之常理，即以一父之子驗之可見也。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以此。

李光地對均的理解是平均分配的意思，正所謂「夫一物而眾分之，烏得不寡然」。他的思維理路是，眾分之則必寡，但為甚麼寡又不可怕呢？因為，只要平均，雖然寡，但畢竟都少有所得，相互之間就不顯得有貧的問題，況且有了均，就無不平之爭，於是就有和，有安，這樣就達到了「蒙孽消而根本固，必不至於傾矣」的目的。李光地這樣來解釋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傳統政治思想中，第一次透露出平均主義的信息，是大區別於前人的。

以上我們考察了解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另一條思維路徑。這種解釋，從思想方法上說，拋棄了訓詁學的方法，不太照顧孔子原話的語言背景，而更多地是從現實社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從解決實際問題的角度，去借用孔子的原話，至於這樣的解釋是否符合孔子的原意，則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問題。

除了上邊提到的一些政治家或文人學者之外，還有一些思想家，更是用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改造了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他們在認定孔子的思想是一種經濟平均觀念的時

有些思想家徑直改變了孔子的原話，使之更順理成章地成為經濟平均思想的根據。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就把「不患寡而患不均」改為「不患貧而患不均」。北魏孝明帝時期的張普惠和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也有類似做法。他們對原話的直接改造，向我們展示了孔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由政治思想命題，轉變為以平分財富為基本內涵的經濟思想命題的過程。

近代學者中，明確將「不患寡而患不均」解釋為經濟平均思想的是俞樾。他說：「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不均則不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俞樾從平均財富的角度判斷孔子的思想，自然認為寡貧二字是出現了錯簡。俞樾大概是第一個對所謂錯簡問題做出說明的人。

候，徑直改變了孔子的原話，使之更順理成章地成為經濟平均思想的根據。

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篇云^②：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董仲舒這段話講的顯然是經濟方面的問題，並且他為了把「不患寡而患不均」表述為是一種經濟思想，就不講任何道理地把「不患寡而患不均」徑直改為「不患貧而患不均」。

類似董仲舒的做法的還有北魏孝明帝時期的張普惠。他曾在一封奏書中說^③：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

張普惠談的不是一個經濟平均的問題，而是主張皇帝對百官要恩澤普惠，公平均等。但是他也徑直使用了「不患貧而患不均」的說法，改「寡」為「貧」。

在古代思想家中，另一位直接改變孔子說法的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他的《日知錄·卷六·庶民安故財用足》篇云^④：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

從離開孔子的語言背景去解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到董仲舒、張普惠、顧炎武等人對這句原話的直接改造，向我們展示了孔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由政治思想命題，轉變為以平分財富為基本內涵的經濟思想命題的過程。這是一個思想發展的典型個案，它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思想發展的歷程，並對後世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起了重大的影響作用。

三

實際上，在傳統文化中，對後世乃至今天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對孔子原意改造後的思想，即從均平財富的角度去理解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這句話在現代人們的觀念中，即是平均主義的思想濫觴。

近代學者中，明確將「不患寡而患不均」解釋為經濟平均思想的是俞樾。他在《群經疑義》中說：「(不患寡而患不均) 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不均則不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⑤俞樾從平均財富的角度判斷孔子的思想，自然認為寡貧二字是出現了錯簡。俞樾大概是第一個對所謂錯

簡問題做出說明的人。董仲舒、顧炎武都徑直改動了孔子的話的原文，而沒有指出其根據和原因。

在當代學者中，從經濟平均或平均主義的角度理解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就成為一個極其普遍的文化現象。孟祥才、胡新生著《齊魯思想文化史》中說^⑩：

儒學的宗旨是追求社會的穩定與祥和。孔子大力倡導的「禮」和「仁」，就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安定。孔子曾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貧窮、弱小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由於分配不均，心理失衡而導致紛爭和戰亂，孔子的所有思想都是從這一基本觀念派生出來的。

李宗桂在《中國文化概論》中說^⑪：

平均平等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之一。平均平等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主要表現為經濟利益上的彼此一樣。平均即是平等，平等必須也必然表現為平均，亦即社會財富的佔有和勞動產品的分配上的平均一致。孔子說：「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治國理家，不怕財物匱乏，就怕分配不均。

王處輝說^⑫：

基於其對富窮對立問題形成原因的分析，孔子提出了一個「安貧」的解決問題方案。他說：「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應為『貧』〕而患不均，不患貧〔應為『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統治者不必憂慮財

富不多，而應憂慮財富不均；不必憂慮人民太少，而應憂慮社會不安定。因為如果財富平均，就無貧窮可言；如果社會關係和諧，就不覺得人少；如果社會秩序安定，就不會有危難發生。

以上這些研究思想史、文化史的學者，在沒有對「不患寡而患不均」進行專題考察的時候，根據一般理解，都將其看作是一種關於平均主義思想的表述，這實際上反映了「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中國傳統思想史上所發揮的實際影響，它已經成為一種似乎無須懷疑的思想傳統。

其次，我們也考察一下經濟思想史的著作，看一下那些經濟學家的理解。熊寤在《晚周諸子經濟思想史》中說^⑬：

自從經濟學者之「限界效用說」出，社會主義者之均富主張，於倫理外更得一經濟學上之根據。蓋同量之財，置諸一社會內，均之效大，否則效小。孔子知其然，故曰：「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子言經濟，專重一均字，其目的在裁抑其所積重，而酌劑其所空虛。

唐慶增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講到孔子的租稅論時，認為孔子主張租稅「擔負之分配宜平均」。他說^⑭：

擔負之分配宜均勻，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季氏篇）。均平學說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居極重要之地位，其意義有二，不但謂：（一）政府斂稅，人民之擔負應均平；其意且謂：（二）政府宜調劑人民財富，使之漸趨均

胡寄窗說：「孔子絕無削富者以濟貧者之意願。……所謂『均無貧』，絕對不是在各階級之間進行財富的強制平均分配，而是着眼在被剝削階級。」胡明確將之歸入平均財富的思想，並認為，後世思想家的平均財富思想，和農民起義中所反映的平均主義思想，都與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着難以割斷的思想聯繫。

平。孔子之前，《周禮》亦含此義，均富之說，支配中國數千年來之經濟理論。

熊寐和唐慶增都毫不懷疑地將「不患寡而患不均」判斷為一種平均財富的思想，並且認為它支配了中國經濟理論數千年的歷史發展。

胡寄窗說^②：

貧富是相對的。人人都富，即無所謂富，人人都貧窮，即無所謂貧窮了。根據這樣的觀察，孔子提出了他的分配主張：「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近代學者有人把這一段理解為孔子的「均富」思想，是不妥當的。因為孔子絕無削富者以濟貧者之意願。……所謂「均無貧」，絕對不是在各階級之間進行財富的強制平均分配，而是着眼在被剝削階級，是使這個階級內部各個集團各個成員的財富分配彼此相近，也不讓他們的財富分配彼此不均……無論如何，孔子的分配概念儘管不是為被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提出，但能初步認識財富分配不均所要引起的矛盾與衝突，也是有意義的。在他以後，許多進步思想家反對貧富不均的言論，常從他那裏取得滋養；封建後期農民起義的響亮口號——「均貧富」未必和孔子的分配觀點沒有牽連。

胡寄窗雖然指出了孔子的平均不是在所有各階級之間進行強制平均分配，但他明確將之歸入平均財富的思想，只不過是僅在被統治階級內部的平均。也就是說，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種明確的平均財富思想。胡寄窗並認為，後世思想家的平均財

富思想，和農民起義中所反映的平均主義思想，都與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着難以割斷的思想聯繫。或者說，正是孔子的這一思想啟發了後人的均平意識，是中國平均主義思想的最初表述。

最後，我們再看一些註釋家或文獻學家的觀點。唐滿先《論語今譯》中，直接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句，改成了「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並註曰：「這句中的『貧』字原作『寡』字，下句中的『寡』字原作『貧』字，今根據文意，互相調換了一下。」^②

劉俊田《四書全譯·論語》中，也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句，徑直改成了「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並在註中引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原文，解釋說：「第一句的『寡』當為『貧』，第二句的『貧』當為『寡』，這樣講起來才與下文相符合。」^③

本文前邊的論述已經說明，對孔子原話中「寡」與「貧」是否有錯簡的問題，自董仲舒以來，就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為一種經學文獻流傳的幾乎所有版本中，都沒有對「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提出疑義，比如《四庫全書》收錄的所有關於《論語》的註本共二十四種，都沒有改「寡」為「貧」。1973年出土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是西漢宣帝以前的抄本，其中〈季氏〉篇中這兩句話和傳世的《論語》讀本是完全一致的：「孔子曰：……之而必為之……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盍均〔無貧，和無〕……」^④由此看來，所謂錯簡說也是缺乏根據的。現代文獻學者譯註《論語》時直接改動原文，其理由是有思想文化上的原因的。他們所謂「與下文相符

1973年出土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是西漢宣帝以前的抄本，其中〈季氏〉篇中這兩句話和傳世的《論語》讀本是完全一致的。由此看來，所謂錯簡說也是缺乏根據的。但在現代文化傳播中，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兩句視為錯簡，主張將其調換，從而使之適合於平均主義的解釋的現象，已是相當普遍。

合」，實際上還是俞樾提出的問題，就是要使「貧」與「均」相對應，因為只有這樣的對應關係，才可能順理成章地將孔子的原話解釋為平均主義。所以，究其本原，主要是關於孔子這段話的平均主義理解，才導致了對原簡的懷疑。如果僅僅從孔子原話的語言背景出發，這些懷疑是無從產生的。

在現代文化傳播中，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兩句視為錯簡，主張將其調換為「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從而使之適合於平均主義的解釋的現象，已是相當普遍。《紹興師專學報》1995年第4期發表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別解〉一文，列舉了這方面的事實。作者董秋成指出：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對這兩句話作註，認為應該是「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註的《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也對這兩句話做了和王力同樣的註解；徐中玉主編的《古文鑑賞大辭典》也持相同的觀點；特別是當《論語·季氏》篇以〈季氏將伐顛臾〉為題被選入高中語文教材時，編者也在課文的註釋中說明「這兩句傳抄有誤，『寡』和『貧』應調換」。這樣的文化傳播狀況，使「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解釋，在現代社會的文化體系中成為真正的主流或正統。

四

總括全文，我們看到了孔夫子強調諸侯大夫應該各安其分，遵守禮之大分、達到政事平均的思想，如何演變成了平分財富的平均主義，看到了

一種思想變成另一種思想的過程。實際上，「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中國思想史上，就是作為一個平均主義的觀念發揮作用的，這是思想史上一個必須予以正視的事實。

思想的傳播是一個無限開放的發展過程，一種思想產生之後，在它的傳播過程中被改造、被發展、被填充進新的內容，是思想發展的基本途徑。如果一種思想命題提出之後，在後世的思想歷史中，人們除了用文本主義的方法對之頂禮膜拜、無休止地回溯其原意便無事可做的話，那則真是這一思想的悲哀。當一個思想家提出了一種思想、一個命題的時候，也就是他為社會和後世提供了一個思維的空間，後人將在他所提供的思想軀殼中發現對現世有益的啟示，用新的時代理念去對之利用和改造，從而將其發展為一種新的對現世有用的有益的思想。這樣，一方面，現實的發展找到了歷史的思想根據；另一方面，前人的思想也藉此有了新的發展。這就是思想的歷史。

當然，認識到思想發展的這一特點，並不是反對我們在思想史研究中做文本方面的研究，並不是反對我們對思想的原創性做正本清源的考察。相反，正是弄清一種思想的原來面貌，才有利於我們認識這一思想的歷史發展過程；對思想的本源清源的考察和清理，永遠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在弄清了一種思想的原創意義的時候，一定不要否定它在後世發展出來的新的思想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就像對於「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考察，我們知道了作為一種平均財富的思想不是孔子的思想，但卻也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古人的思想，是蘇綽、張方平、李光地等人

一種思想產生之後，在它的傳播過程中被改造、被發展、被填充進新的內容，是思想發展的基本途徑。雖然從平均財富的角度解釋「不患寡而患不均」，違背了孔子的原意，但不等於說這種解釋沒有價值。從平均財富的角度理解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已經取得了一個思想命題的價值和意義，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個反映平均主義思想的有價值的命題，並從中汲取有益的啟迪。

的思想；從平均財富的角度解釋「不患寡而患不均」，違背了孔子的原意，但不等於說這種解釋沒有價值，沒有思想史上的意義。從平均財富的角度理解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已經取得了一個思想命題的價值和意義，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個反映平均主義思想的有價值的命題，並從中汲取有益的啟迪。

註釋

① 有關的論文有：關鋒、林聿時：〈論孔子〉，《哲學研究》，1961年第4期；李守庸：〈關於孔子的「均」的經濟思想探討〉，《光明日報》，1962年3月12日；何克讓：〈論孔子的「患不均」思想〉，《江漢論壇》，1983年第3期；唐澤玉：〈「不患寡而患不均」辨〉，《齊魯學刊》，1984年第1期；楊樹增、侯憲林：〈從《論語》看孔子的經濟思想〉，《河北學刊》，1986年第1期；董秋成：〈「不患寡而患不均」別解〉，《紹興師專學報》，1995年第4期；傅允生：〈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辨正〉，《歷史教學》，1999年第5期；黃武強：〈孔子語「不患寡而患不均」新論——兼談孔子的愛國言論〉，《學術論壇》，2000年第1期；等等。

② 《論語·季氏》，《十三經注疏》本。

③ 魏何晏解，梁皇侃疏：《論語集解義疏·卷八》，四庫全書本。

④ 陳祥道：《論語全解·卷八》，四庫全書本。

⑤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論語集註，卷八》，四庫全書本。

⑥ 《日講四書解義，卷十》，四庫全書本。

⑦ 令狐德棻：《周書·蘇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頁390。

⑧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五十五》，四庫全書本。

⑨ 黃裳：《演山集·卷五十九·雜說》，四庫全書本。

⑩ 劉寅：《三略直解》，卷下，四庫全書本。

⑪ 李光地：《榕村四書說——讀論語劄記，卷下》，四庫全書本。

⑫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228。

⑬ 魏收：《魏書·張普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1745。

⑭ 顧炎武：《日知錄·卷六·庶民安故財用足》，四庫全書本。

⑮ 轉引自熊寐：《晚周諸子經濟思想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頁43。

⑯ 孟祥才、胡新生：《齊魯思想文化史——從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頁153。

⑰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頁356。

⑱ 王處輝：《中國社會思想史》，上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頁66-67。

⑲ 熊寐：《晚周諸子經濟思想史》，頁43-44。

⑳ 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78。

㉑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頁92-93。

㉒ 唐滿先：《論語今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170-71。

㉓ 劉俊田：《四書全譯·論語》（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291-92。

㉔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77。

李振宏 男，1952年生，河南偃師人，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史學月刊》編輯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史學理論、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